

嚴歌苓小說中的移民女性形象

朴馬利阿*

目 次

引言
一、重建女性
二、直面人性
三、反叛世規
結論

引 言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人移民西方的情況可以追溯到古代王朝，但大規模的移民現象發生在鴉片戰爭前後，當時由於清政府的封建統治日漸沒落、加上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和剝削，人們走投無路，爲了謀生而移居於海外。另一方面西方列強侵略國爲了販賣華工，誘騙和綁架中國人民，因此當時許多人被迫便成了“苦力貿易”的犧牲者。據歷史記載，“《大清律例》明文禁止國人出洋，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列強逼迫清政府承認華工出國爲合法。這樣，英國侵略者便迫不及待地實行了所謂的‘自由移民’制度，本質上還是誘引華工出國”。¹⁾以華工的身份居於國外的人們並無尊嚴可言；大量的勞動力湧入移民國的勞動市場，中國的勞動力在移民國具有很大的競爭力，移民國的本地居民感到某種

* 大真大學 교양학부 강사

1) 楊麗麗、林玉琳、李翰、富瑤、範麗君編著，《歷史上的大移民》，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頁。

強烈的“威脅感”，便出現了排華運動，“整個排華浪潮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中葉”。²⁾

到了20世紀，海外思潮湧入中國，當時具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的總體觀念隨之發生了變化，開始對本國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和批判。他們中的不少人為了救國圖強而留學於海外，竭力接受新觀念的洗禮。這些知識分子群體包括從事自由創作的作家，他們在海外或者歸國後紛紛拿起筆墨呼籲社會體制與國民意識的變革。這與中國勞工被強制引到海外勞動市場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海外留學潮給中國國內帶來了思想上的革新與顛覆。這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移民海外史的一個新內容。

新中國成立前後大部分的知識分子熱衷於留學俄羅斯，而改革開放的新浪潮則開啓了中國人留學、移民海外的新局面。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與許多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從此中國向西方派出了大批的留學生；而且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經濟迅速發展，自費留學的人數大幅度增加，於是出現了海外移民留學的新高潮。知識分子群體相對穩定地居於海外，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的凝聚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其海外身份也逐漸得到當地的認同，他們除了活躍於經濟領域外，在文化方面也積極尋求自我表達，於是海外華人作家群體便自然形成了。嚴歌苓便是這一作家群體中的一員，她以移美之前原有的作家天賦為基礎，在國外生活中不斷開掘新的題材，特別是通過對移民女性形象的塑造，建構起自己獨特的文學審美視界。

嚴歌苓筆下的移民女性形象，她們所表達的思想文化脈絡主要圍繞探討女性生命的真實表白與性靈的自由訴說來展開。這些女性形象超越出傳統女性的“宿命”意識，顯示出了以女性生命自覺來建立自我世界，敢於直面人性，甚至還勇於顛覆、叛逆社會規則的女性意識。即，嚴歌苓小說的表達力時常超出人們的想像，特別是她所塑造的大多女性形象承載著女性本質的生命力；這些外

2) 楊麗麗、林玉琳、李翰、富瑤、範麗君編著，《曆史上的大移民》，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頁。

柔內剛的生命力可以顛倒性別文化的秩序，甚至足以推翻人們對人倫的普遍認識。嚴歌苓對移民女性形象獨特的觀照視角，恰恰與其他海外華人作家所塑造的移民女性形象之間形成了明顯的對比。比如，少君、曾寧、曉魯、邵丹等作家筆下的移民女性形象因超越不得殘酷現實而絕望，理想與現實間發生沖突時消極沮喪，表現了女性的宿命意識與女性自我面對外界時的百般無奈。另外，原志、餘曦等作家以母性的犧牲精神為主題顯示了不變真理中的女性價值。

與其他海外華人作家對比，嚴歌苓所塑造的移民女性形象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她們不被外界的因素所幹擾，也不是被社會的規範所操縱、牽引。她們是以對個體生命的獨立思考與自我感知力建立了自我世界，甚至以背叛社會倫常的形式去探究著自我內心的矛盾。嚴歌苓對女性意識的細膩體察不僅隱含著當代女性敢於打破陳規定律進而放逐自我的心靈狀態，也折射出當代移民文化已從歷史的黑暗中走出來，能夠自由飛翔的現狀。

一、重建女性

出生於上海的嚴歌苓曾參加過人民解放軍的文工團，一邊學習舞蹈到各地巡演，一邊熱衷於寫作，1978年發表了處女作童話詩《量角器與撲克牌的對話》。到了1980年代後期嚴歌苓赴美留學，創作了許多反映移民生活與移民文化的小說。她以自由奔放的創作態度投入寫作，在小說中塑造了多彩斑斕的人物形象，成爲了一位“多產高藝”的海外華人作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她筆下的當代女性形象們，其靈肉所承載的自我意識貫穿在整個移民小說中，展現了女性重建自我家園的精神追求。這些女性形象表面上看來是被男性引導和操縱、或被外界的種種規範所牽制，但最終她們所具的女性之自然形態——包容世界、感知世界的——超凡能力戰勝了一切，她們精神與軀體的詩意和真誠感動、包容了看起來與她們對立的整個世界。這清楚地呈現了女性個體的審美法則，與此同時，閃現出女性氣質所特有的審美意蘊，由此而突出了女性主體的生命

狀態。尤其是嚴歌苓的《少女小漁》與《扶桑》等作品中所勾畫的女性世界既直接純粹又充滿了激蕩的放逐和遊離，沒有絲毫的掩飾和裝扮，她們天然的品行與女性氣質所顯示的力量打破了所謂“權威世界”的成規舊例。

《少女小漁》中，一個叫江偉的男人剛認識小漁時，對小漁對人無所顧忌的天真與隨性而走的情態感到疑惑不解。但他未充分考慮這些問題就出國了。過了半年江偉從悉尼發來消息讓小漁到悉尼來一起過日子。接到消息的小漁沒經過深思，便到了悉尼，此後一邊打工，一邊上學，後來為了解決簽證問題花掉不少費用找個老外辦了一場假裝婚禮。當時小漁才二十二歲，老頭卻是個六十七，在年齡方面已大為失衡的這場婚禮讓小漁感到有點兒可悲，但她還覺得那場婚姻不那麼恐怖，對老頭的裝扮也比較滿意。老頭因一輩子都沒指望正式辦婚禮而在這場戲中真摯地扮演著自己的角色，老頭的這一處境還令小漁對他生出一份哀憐之情。與小漁在婚禮中表象形成對比的是江偉，他既憤恨又沮喪得“喉節大幅度升降，全身青蛙肉都鼓起，把舊貨店買來的那件西裝脹得要綻線”。³⁾婚禮結束兩人回家後，江偉發了瘋似的把小漁拉進廁所用截手紙狠勁兒擦淨了她嘴上的口紅，又伏在她肩上流了一陣傷心的眼淚。江偉對小漁如此蠻橫又虛弱地發泄自己的委屈時，小漁並沒有掙紮反到為他的痛苦而歎息不已。儘管婚禮之後小漁對江偉的感情毫無變化，但江偉對小漁的猜疑和監視日漸加深，他不斷地對小漁發牢騷又發脾氣發泄自己的情緒。江偉每次因遏制不住妒忌的心裏激憤而對小漁發牢騷時小漁並不以頑強的態度對峙，也不以無奈和軟弱屈服於對方，而是以溫柔和寬解以及無限的體諒撫慰江偉的心。江偉每當面對小漁的從容和寬慰，在感到一陣震撼的同時，逐漸陷入迷宮似地被她迷惑。

這些日子裏，因小漁“婚後”還與江偉同住的情況，引起移民局的懷疑，小漁便暫時搬到老頭的家，扮演起了“小妻”的角色。小漁住於老頭的家期間，了解到老頭與他的情人瑞塔之間的相互關切，又隱約感到他們相處中所存在的有些不可縫合的感情間隙。雖然老頭對待小漁時並無有性的激情與出軌行為，但

3) 嚴歌苓，《少女小漁》，見於《無非男女》，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頁。

瑞塔還是看不過老頭與小漁之間的某種“默契”和老頭的“變質”便離開了他，為重找“新愛”去了。瑞塔走後，老頭稍有精神失落的恐慌，但他還是打起了精神，到外面去賣藝。有一天，江偉約小漁去海邊時，兩人在那看到正為行人拉琴的老頭，這時不巧下了一場大雨，老頭一人忙著捕捉被風雨卷去的鈔票。小漁見到他那可憐相便要幫他，她揮掉江偉的挽留，去幫老頭撿了鈔票。這一場意外的情況給老頭深刻的印象，而江偉因無力截止小漁忠實於自我情感(即使是出於同情心)的局面，心裏極為不平，但他又離不開小漁。

從此之後，老頭對小漁更為在心，也在精神上更加依於她。但過平淡的日子不久，老頭突然癱瘓，臥床不起。小漁把老頭送進醫院安頓好。因江偉的再三催促，小漁就要離開病床上的老人時，被問起今後能否參加自己的葬禮，小漁不管江偉將如何反對，答應了老頭的請求。老頭流著熱淚目送著那短暫結緣的“妻子”，在那對渾濁的眼睛裏便發出期待與感激之情。

從整篇的故事來看，小漁並不為愛情搭命，也不問世間的是非，而她只是以自我生命的熱誠對待一切。蘇珊·布朗米勒曾說：“女性特質的內涵依賴於一整套已經得以確立的傳統——從衣著打扮的樣式到行為舉止的法則。……接踵而來的是，某些隨意性很強的東西——例如髮型、說話的語氣或者對待工作的態度——卻成了判定性別的因素，它們類似於暗示性的記號和符號，反過來起到保護既定社會價值觀以及抑制社會變化的杠杆的作用。”⁴⁾

正如蘇珊所說的那樣，社會將女性的某些特質或氣質限於某些定律之中，面對女性群體期待其氣質的顯現，但一旦在一個女性身上發現與那些定律的疏離，便將她劃分為與男性對立的特殊群體，以忽視和蔑視的目光對待她們。這是長久以來延伸下來的社會法則，以眼淚和歎息相伴的女性史就是在這些定律的制約下跌跌撞撞走下來的。到了當代背著女權主義的包袱，女性們對女性氣質似乎表示出敏感反應，而向往著成為脫去“女性之外衣”的女強人。當下，隨著人們意識的不斷提高，人們逐漸認識到女性問題的關鍵，“人們去正視一個正

4)[美]蘇珊·布朗米勒，徐眼翹 朱萍譯，《女性特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236頁。

在出現的事實：問題不在於某些婦女錯失了女性特質，而在於女性特質未能成爲一個可靠的目標”。⁵⁾嚴歌苓所塑造的小漁可以說就是反映當代性別意識的產物，她在作家所精心設計的情節之中始終扮演著保持自然形態的女性特質，以對世界的寬容和柔和面對生活，以此包容異國人們的“越來越接近於成爲她們自己”⁶⁾的女性。

嚴歌苓的另一部小說《扶桑》，雖與《少女小漁》是不同的內容，但兩篇小說的故事主題卻是極爲相似。

《扶桑》中的扶桑原本是個被拐賣到美國在唐人街做妓女的女子，她常被人惡罵、毆打，甚至有時在拍賣場上被裸著身體，等待新的買主。但讓人感到奇異的是她從不懊喪、憤恨，而以天生的溫存與和順面對人、面對世界。十四歲的美國男童克裏斯第一次邁進妓院見到扶桑時，她那奧秘般的“和諧姿態”讓他震驚、入迷而永不忘卻。克裏斯在有錢有勢的家裏成長，不過他孤苦的靈魂在別處得不到安慰，而扶桑的溫和能消除他心理深處的壓抑，讓他能從世間的一切傷懷中解脫出來。但一生迷戀於扶桑的不只是克裏斯，而性情火爆的妓院老板大勇，認識扶桑之後不僅棄除了自己的貪婪和頑強，也用自己的真誠對待扶桑，甚至有個美國牛肉商公開指責中國妓女敢進劇場侮辱扶桑時，大勇挺身而出出槍殺了牛肉商而自己被判爲死刑。這時候他已知扶桑原本是個家鄉父母給自己娶進門的妻子，因此臨死之前堅決地和扶桑辦婚禮。

扶桑並不具有耀眼的誘惑力，她與小漁同樣以和善和誠懇，寬容了這世界的齷齪和汙穢，因此在她們面前跪下的不只是兩個男人，而是超越種族的世界。也就是說，小漁和扶桑以女性本質中的慈祥 and 寬恕情懷沖破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和排斥，從緩和與彌補人間隔膜分歧的過程中找到了女性主體的意義。這並不屬於女性單純的善良或犧牲，而是作家將女性的自然特質當作女性的自我價值力量，不加修飾地把它展現出來。這也並非屬於二元對立的性別兩極化（gender polarization）的問題，性別兩極化理論牽涉到世界兩極化的問題，

5) 同上，第237頁。

6) 同上。

如，天與地、好與壞、精神與肉體、天才與傻瓜等，將世界的一切清清楚楚地劃為兩道線。性別兩極化又能延伸為高低貴賤的等級觀念，由此會得出極端、荒謬的結論。女性氣質並不能以性別兩極化的方式單純地看為屬於男女等級範疇中的一極，而女性氣質的“劃分被女性主義稱為一種意識形態：因為它有一套思想體系、分類標準和價值觀念在其中”。⁷⁾嚴歌苓主要把女性看為貼近自然的存在，這在排除極端分離的性別特質意義上講確實很有說服力。因為“女性的心裏似乎更接近自然，如重情感、非理性。女性相對來說更看中人際互動，更主觀，更有貼近感”。⁸⁾嚴歌苓的女性觀並不是為兩性對立、兩性等級而存在，而是強調最為純然的女性本質。

嚴歌苓筆下的小漁和扶桑以女性的自然性情面對世界、了解世界，更重要的是她們自身的生命意識蘊含著執著溫吞的自我，因此並不被外界的“威脅”壓抑和埋沒，而是平穩地展開翅膀向自我的樂園高遠地飛翔。可以說，嚴歌苓長期專注於被男性蔑視甚至女性追求男性化而疏遠的女性自然本質，使女性自然本質回歸於女性自身；與此同時，將之與女性自我合結起來，借移民女性形象重建了女性自我世界。

與嚴歌苓的描述相反，少君的《洋插隊》、曾寧的《蛙穀女媧》等小說中的移民女性形象所表現的是被殘酷的環境所馴服、服從，在汙濁的世態中失去自我的女性。也就是說，《洋插隊》和《蛙穀女媧》中女性的天然本性仍舊被貶低和壓制，從未被他人甚至自己也那裏得到認可。

《洋插隊》中的“她”原本是個在上海有夫有子，而且做過英文老師的女人。但到了尋找更大的發展到澳大利亞之後，因為澳大利亞政府對中國移民者採取的不完善政策，“她”不僅未能享受良好的教育環境，還為了生存不得不打下各種苦工，甚至要忍受當地政府不斷拘留和驅逐打工者的殘酷折磨。因此，“她”來澳大利亞生活穩定了之後接來丈夫和孩子的美夢破滅了，“她”為解決住宿問題出賣了自己的身體，在打工糊口的人流中不懈地爭取謀生的機會。在這樣

7) 李銀河，《兩性關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頁。

8) 同上，第254頁。

的悲慘生活中“她”唯一的歡樂就是把一點錢寄到本家，為不知一切的丈夫和孩子做一點補償。

此外，曾寧的《蛙穀女媧》中，從中國鄭州來蛙穀的女媧，與《洋插隊》中的“她”同樣，在家鄉有個兒子。女媧為了在異國優越環境中找個活路來到蛙穀，但與她有婚約的香港人吉米屢屢延期他們的婚禮，只利用她美麗的相貌在自己當經理的酒店裏讓她陪個客人倒酒、賣笑。女媧時時刻刻想到自己的“傻孩子”，那是在家鄉裏發生水災的時候女媧被強姦而生的，但他畢竟是自己的親生骨肉，女媧一想起他就不覺流下熱淚。在陌生的異國，無處安身、無處安心的女媧，還抱著“作孽”的悲痛不斷地彷徨和漂流。

《洋插隊》中“她”的女性特質仍然停留於“犧牲”兩個字，而這一“犧牲”由於在無自我的基礎上顯現，因此沒有根基，只能暫時保持外在形態，而終究會失去自身的本質。而且光以“犧牲”來證明女性自我存在的方式，可以說仍是沉浸於舊社會所設置的女性定律中不能自拔的一種消極性表現，因此得不到當今社會女性意識的呼應。也就是說，“她”毀滅自我得來的微小的“補償”，最終會使女性的本質消失，替而代之的就是她空蕩的軀殼而已。《蛙穀女媧》中女媧的“忍受”也同樣如此。女媧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始終遭遇男性的欺凌，在艱難的人生旅程中她唯一能支撐自己的就是“忍耐”。可以說，“忍耐”是她女性特質的一種象徵，她對待世界、看待人生的方式。女媧與上面所述的《洋插隊》中“她”同樣未能維護和樹立自我，而僅僅拿封建式的“女性定律”中的某一部分來“掩飾”自己又撇開自我，因此未能體現出自己體內熱血噴騰的自我，也嘗不到作為女性的真正滋味。

總之，嚴歌苓在移民女性形象上所承載的女性氣質以及所附加的女性自我之含意，在重新思考女性本質的意義上給予讀者很大的啟發。與其他作家筆下的移民女性形象不同，嚴歌苓將女性從陳規定式中走出來，以自己獨特的視野塑造出了能保持自我又以自身的天然特質展示人生的人物形象，體現了當今社會女性意識的再一次“華麗轉身”。

二、直面人性

嚴歌苓塑造移民女性形象時，所關注的並不只限於“認同女性自我”這一層面。她以敏銳的直覺還洞察到當代女性直接面對內心欲望時的趨向與向往。在嚴歌苓的其他書寫中，除了繼續否定以陳規定式捆住和限制女性特質外，作家在描寫女性形象時還更為深入地追索女性的生命需求，反映出當今社會女性直面人性又重生命感覺的心靈世界。如在《搶劫犯查理和我》、《失眠人的豔遇》等中都表現出女性靈魂的企盼，顯現了當今社會女性人格的索求與情感脈絡。

《搶劫犯查理和我》中，“我”初見查理的時候就是他正要搶劫“我”的時候。當時“我”從學校回到家用鑰匙開門的刹那，查理假裝來找人的樣子，與“我”一同進了門又上了樓，而突然在“我”的背後勒住了“我”的脖子搶走了項鍊和包裏的錢。事後，“我”報了警，但警察問到搶劫犯的相貌與特征時“我”根本想不起他的長相，而“我”只記得他所具的奇特的溫存和極為柔和的聲音。後來“我”的男友拜倫，由於“我”在和他結婚的事上變了掛，從西部飛到芝加哥要摸清“我”的情緒。兩人相逢了之後，便進了酒吧，這時“我”看見了一個少年，他正是個上次“所見”的搶劫犯。“我”因好奇故意和那搶劫犯同坐時，不知情的拜倫也參與了這番“遊戲”。“我”端詳了一陣搶劫犯，並細查了他的每個動作，“我”的好奇心便得了點滿足感，“我”的心暗中狂喜。這時候，查理突然起身往外走了，一瞬間“我”擔心搶劫犯的走失，不過他又回來了；那時他手中拿了一枝玫瑰花，他把那花獻給了“我”。不知真相的拜倫只是為“我”驕傲，和那搶劫犯談起各種世情來。這時候奇異的事發生了。桌布低下的“我”的手被那搶劫犯握住了。但“我”沒有撇開查理的“親近”，反而應合於他與“我”之間的遊戲，並沉浸於“病一樣纏人的、不三不四的情愫”。⁹⁾

拜倫走後，“我”為準備畢業作品忙碌著，“我”擔任寫劇本，“我”的合作者

9) 嚴歌苓，《搶劫犯查理和我》，見於《無非男女》，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頁。

李梅擔任拍攝。李梅招來的一個志願男演員便是個搶劫犯查理，他的這次“重現”給“我”帶來永生不忘的情感體驗。事情起於拍攝的過程中，由於查理與女演員的搭檔並不理想，“我”就主動去示範接吻的場面。由於這次的接吻“我”和查理之間形成了微妙的氛圍，從此之後，我和查理的關係進一步地親密起來，他來“我”家吃飯，兩人牽手一起散步，查理還對“我”告白：“我愛你”。我預知查理和“我”將要面對的是不可圓滿的結局，也深知那的確是自作自受的創傷，但“我”一直拖著已經注定的分離，而從自己的情感體驗中認知裸露的，不加掩飾的原始自我。但後來“我”再不能默認查理的搶劫癖，這時候他竟然再次搶劫“我”，“我”便報了警，家也搬了。即便如此，“我”又一次偶見查理時為應征的他默默地祝福，也認可他再次的愛情告白。

在這個故事中，“我”對查理的情感流露沖破了狹義的男女情感模式。“我”與查理的奇戀深化了女性欲望的闡釋和展現，又全面拆解了道德、倫理對女性心理的欺騙和掩飾。這是最為個人化的情感表達方式，也可以說是既模糊又真實的抒情意象。這豐富了女性情感經驗的內涵，也賦予女性生命體驗中超越世俗的一份詩意。波伏娃曾說：“男人生活在一個協調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一個可以包容在思想裏的現實。女人則在勉強對付一種有魔力的、蔑視思想的現實，通過沒有真實內容的思想去逃避它。她不是接受自己的生存，而是在虛無縹緲中對自己的命運這個純粹的理念苦思冥想；她不是去行動，而是在想像的王國中樹立自己的形象；就是說，她不是去推理，而是去夢想。”¹⁰⁾儘管波伏娃將女性看為第二性，以上述的陳述慨歎女性的命運與性情，而在當今社會“至少她們不必忍受前幾代人的自欺欺人的全副武裝”，¹¹⁾女性可以盡情表述自我的感知，超脫性別文化的歧視，去建構能直面人性的世界。《搶劫犯查理和我》中的“我”正是從尋找自我的情感到享受情感的整個過程中一直不以逃避的態度面對實情，獨自對自我感情的脈路有所擔當。這可以說是，嚴歌苓書寫女性的獨創

10) [法]西蒙那·德·波伏娃，陶鐵柱譯，《第二性》，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62頁。

11) [美]蘇珊·布郎米勒，徐眼翹 朱萍譯，《女性特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頁。

方式，也是作家不把女性看為被粉碎的“零體”而將她們建構為完整個體的書寫模式。

與《搶劫犯查理和我》中的“我”比起來，《失眠人的豔遇》中的“我”更為注重內心的測試，它所探討的是女性的敏感直覺和孤獨所投射心靈律動。也就是說，若是《搶劫犯查理和我》中“我”通過對查理的迷戀給自己打造了一個最為隱私的空間，那麼《失眠人的豔遇》中的“我”則以忠實於自我意識的方式建造了與自我溝通的隱秘渠道。

《失眠人的豔遇》中的“我”是個剛拿到藝術學位的，平時打五花八門的工，辛苦地掙錢而懂得獨享快樂的人。但“我”在生活中有個很大的缺陷，那就是長久讓“我”陷於疲憊、煩躁情緒中的失眠。雖然是單調的日子，但世事往往是不可預測的。有一夜的凌晨意外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那一夜也是與其他數不清的夜同樣，不管“我”怎樣努力、用心也不能安睡，因此，

“我放棄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溫存和耐性，離開了床。床的一步開外是窗子，打開來，捂在我臉上冷稠的冷中有異國的陌生。還有一種我從未體驗過的敏感。我發覺了它——挺遠一座樓上，在與我相仿的高度，又口窗亮著。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輾轉得瘋狂和疲憊都到極致時，我會突然想：哎，去看看那個窗，還亮不亮著。它亮著，一夜夜亮下去了。我開始想，這是個不平凡的對稱，一個秘密的與我的對稱。”¹²⁾

從此之後，“我”下決心去找到那窗口的主人。“我”問了警察即使沒有信息也能找人的方法，又走路、乘車地苦找了一番窗口的主人，結果卻一無所獲。

“我”心中之謎還未解開深深的遺憾，就去了諮詢台想問一問相關情況時，在那兒偶然遇見了“老美”，因“老美”與“我”已相識，“我”就對他說起了來諮詢台的目的。“老美”聽完“我”荒唐的陳述之後，就將“我”的迫切看為一場“胡鬧”。這期間每夜都失眠的“我”對於其他人感到一種讓人痛苦的隔離感因此而感到痙攣的孤獨，而“我”覺得“老美”多少理解“我”的心緒，有一天兩人就一同睡了。但

12) 嚴歌苓，《失眠人的豔遇》，見於《無非男女》，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頁。

“我”看到“老美”緊依著“我”睡去的樣子時，極深的背叛感沖“我”襲來，這時候“我”便想到自己撇下對面門窗的“罪過”而撲向窗子。“在撕開窗簾時，我心裏是陣神秘的劇痛。遙遠的樓上，那個窗仍亮著。我承認我的不忠貞，但我不是存心的”。¹³⁾此後“我”就躲避那“老美”，“我”周圍的人並不了解“我”為何撇開斯文、好看，收入又不錯的他。回到“本位”的“我”，仍欣喜地享受著“對面窗口”的每夜陪伴，“我”的那份暗中的“喜悅”一直延續到“對面窗口”的突然死去。

“我”與“一口窗門”的談情細致地描繪了在一個獨房公寓中的女人所要承受的孤寂與寂寞。移民於他國的陌生感，比一般人更為敏感的情緒，重壓著“我”的脊梁，困苦著“我”的心，這時候每夜亮著的“一口窗門”成為了“我”的知己。無人理解“我”伶仃、孤悶的靈魂時，“我”寧可與“一口窗門”交換心靈之語，而不願依世俗的肉情歡愉發泄自己的苦悶。

由此可見，《搶劫犯查理和我》與《失眠人的豔遇》雖然表現自我情感的形式不同，但在兩部作品中的“我”都不再回避自我心靈的要求，敢於接納、實踐內心所渴望的“個人經驗”。這可以說是女性情感如何融入自我思維和行動的問題，也涉及到女性如何與社會文化交涉的問題，因此在探究女性心理與社會關係的意義上，這些話題蘊含著女性主體成長史的“代言”。就是說，以個體為本位的當今文化機制打破了只有“第一性”能侵占欲望領域的共識；嚴歌苓以“我”的情感表露充分展示了女性通過拆解成規範式的女性情感表象而成為主體的過程。這是作家投射當代女性意識的途徑，也是不再隱瞞和掩飾自我向現實進行的一種挑戰。

如上所述，嚴歌苓筆下的這些移民女性形象主要探討的是隨個體情感遊走的，從內到外的私人體驗，而不是因外在的因素內心壓抑的女性心裏。與嚴歌苓的書寫相比，劉荒田的《又見‘薈娘’》、曉魯的《頭髮問題》和邵丹的《感談人生》等移民小說則表現的是被外界的幹擾而冷落在旁的女性情感世界，是在避諱自我情緒的“走失”中不斷壓抑著內心需求的女性自我。

劉荒田的《又見‘薈娘’》中，雷蒙與貝蒂一對中國夫妻移民於美國之後一同

13) 同上，第141頁。

在餐館裏工作，但不久雷蒙之妻貝蒂便要承受三角關係的痛苦。雷蒙與嘟嘟發生關係之後，他一開始為不讓老婆看破實情小心翼翼地與嘟嘟來往，不過時間一長，他的偷情變為正當之情，兩人明目張膽地送接秋波、打情罵俏。貝蒂要忍受的不僅於此，她在這樣的心酸日子中，還發現雷蒙原有“第一房夫人”，那個女子獨居在香港，雷蒙竟然把貝蒂娶為“二奶”。而且雷蒙還染上了賭馬之癮，房屋的分期付款為還清賭債也賠進去了。丈夫的背叛與生活中的重擔下，貝蒂以“認命”來做心理支柱，為了孩子、也為了“保住”家庭，大半生忍受了殘忍的折磨。

除此之外，曉魯的《頭髮問題》和邵丹的《感談人生》講述的故事也同於《又見‘蒼娘’》所闡釋的對女人命運的無奈與自由意志的放棄。曉魯的《頭髮問題》中的老武和他的妻子梅雲從大陸到美國來已過十年了。這十年當中他們倆開個餐館起早摸黑地辛勤操作，因此梅雲的青春被日夜操勞的歲月埋沒、腐蝕，毫無痕跡地流逝了。梅雲當初來美國時，原想一邊打工，一邊上夜校學英語，謀求自我發展。但老武心裏萬分不願妻子的“自在”，因此他堅決地開個餐館在梅雲的手上套上了“手銬”。後來平時乖巧不過的女兒米雪爾將頭髮染成血紅的顏色出現在那對夫妻的面前時，引來老武對此的不滿之聲，而此時梅雲已“沉澱”了的心底卻忽然起了波浪般的欲求。梅雲回想起過去的自己，要重找自我的心靈之表述。因此，一天早上她突然對老武宣布當天不想上班而要去發廊的打算，那是失去自我十年之後的頭次“抗議”，但那反抗的聲音還是微弱的，而且是太晚了的。

邵丹的《感談人生》中，劉欣移民於蛙穀之後在星巴克偶遇了現在的丈夫，便和他結了婚，生了一個兒子。她剛到蛙穀與他相識的時候對生活滿懷期待感，但真正有了家庭之後，一切變得那麼單純、無聊，沒有生命力的生活，不斷折磨著她的心靈。她自己也說不清這些憋悶的來由，但她在生活中總感到一種挫折。在忍耐自我心理的折磨時，她想到自己的兒子，“兒子是她的另一種生命方式”，但到底“兒子是另一個生命”。¹⁴⁾她正不斷地追問自己如何消除內心的陰影

14) 融融、陳瑞琳主編，《一代飛鴻：北美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說精選述評》，北

卻找不到答案時，剛離婚的她的親友小純自殺了。小純的極端與她的沉淪，鮮明地畫出了她在生活中的掙紮和她對所有希望的放棄。劉欣通過親友的絕命清楚地看到了自我心靈的悲慟與挫敗，她覺著小純也許是替自己死的，一場慟哭暫時抵消了她的絕望，但劉欣將來要打發的漫長的日子，卻沒有變化的預兆。

嚴歌苓曾評《感淡人生》時說：“劉欣和小純是抵抗異化的孤單英雄，而小純的結局告訴劉欣，抵抗是徒勞的”。¹⁵⁾換句話說，劉欣看到自己心漂浮於半空中，連自己也拽不下來時，她已預感到自我的變形和異化。但劉欣脆弱的自我，不敢去擋住靈魂的垂死。與此同樣地《頭發問題》中梅雲被沒有生命力的生活所封閉、捆綁，長期以來的那些束縛讓她透不過氣來，但她察覺到要發出喊聲時，她那顫抖的聲音微弱得淒慘，遠不夠力量拯救自己的靈魂。與她們比起來，《又見‘蒼娘’》中的貝蒂似乎具有強烈的意志，但那意志卻是為忍耐和吞聲而存在的，它是女人的曆史中根深蒂固被滋養著的只獻於奴役和從屬的良質肥料。在這意義上，她們的形象與《搶劫犯查理和我》與《失眠人的豔遇》中的“我”顯出了強烈的對比感，即，若《感淡人生》與《頭發問題》中的女性形象表現的是被無形的絕望日夜吞噬著生命之養，最後只剩下孤困的女性自我，那麼《搶劫犯查理和我》與《失眠人的豔遇》中的“我”以敢於挑戰的“實踐”心理面對世界，因此而即使不能完全洞解人生之謎，也嘗試到、體驗到了個人化的生命過程。這可以說是作者代表當代女性心理的陳述者，向世界表露了女性私人化空間的建構與對女性直面坦白人性的認同。

三、反叛世規

在嚴歌苓的書寫中有關女性主體的探討與對個體性別權利的認識，充分顯示了經過艱難的成長與涅槃過程已進入成熟階段的女性自我。但作家探究女性

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版，529頁。

15) 同上，第542頁。

問題時所洞察到的不僅於此，她還以超前的感知力，洞悉出了已爛熟、發酵甚而發出異味的情感欲望，因而她將對立常規、超越本質的異流氣質注於一些移民女性形象中，淋漓盡致地表現了當代女性意識中的叛逆性。特別是《紅羅裙》與《約會》等作品已越出了關注“性別困境”的語境，而闡釋和解析了自由奔放的當代文化氛圍中，隨了情感的驅使，不斷造出欲望的躁動而逾越常規的女性意識。

《紅羅裙》中海雲的少將丈夫軍事演習中發生事故失了命，但海雲不為這次的遭遇掉眼淚，那是因為她嫁給少將是為生一個兒子，而不是因為愛他。後來，海雲與已年過七十，也有個成年兒子的周先生再婚了，她這次渡海嫁給年老的目的就是讓兒子健將在舒適的環境中受到良好教育。因此海雲跟著老夫到美國時，帶了兒子過去，此後本是將兒子視如生命的海雲，更加與兒子形影不離，兩人每分每秒都相伴相隨。特別是因海雲喜歡逛街買衣服，她每次到商場，健將就陪伴著她試穿的衣服是否貼身或合適。又到家裏海雲試穿衣服，她的健將就在她身邊麻利靈巧地幫海雲“伸手到裙子裏面，去押平貼身的襯裙”，他的這套動作“一看便知是常常做，徹底懂得了女性著依的要領和竅門”。¹⁶⁾每次穿著新衣照鏡子左右打量自己時，家裏三個男人的目光都聚於海雲那奪目光彩的身上。周先生與前妻美國夫人所生兒子卡羅被她的鮮亮姿態鉤去了魂，卡羅暗暗嫉妒健將與海雲無比親密的關係。

但有一天健將不在身邊時，發生了海雲從未經曆過的“犯禁忌”事件。那天海雲不知不覺迎合了卡羅的“懇求”以照大鏡子試衣的名義進了他的房間。這時“卡羅的手指很輕地順著她平整、年輕的脖頸滑下。那無聽眾的鋼琴家的手指觸摸著她的肩、臂。海雲見鏡子裏的自己已是餛飩一團白色，已溶化得沒了原形。她從沒體會過這個溶化過程，它真值得拿死去換。

海雲感到那雙無出路的鋼琴家的手移向她的腰部。忽然卡羅以一個令她意外的動作矮了下去。她清理一番視覺和感覺，發現他跪在她雙膝間，臉埋在她

16) 嚴歌苓，《紅羅裙》，見於《無非男女》，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頁。

稀滑的白色裙裾上，渾身蟲似的蠕動，拼命躲避他想要去觸碰的部位，多沒出息，沒出息得如此動人。

‘I…Love…You!’他吸溜著鼻涕，口中發出喝粥般的聲響。

海雲一動不動，但渾身都是激情。”¹⁷⁾

之後，因健將的事周家的四個人相互鬧翻了一陣，海雲因卡羅把健將逃學的事告狀於父親像瘋了似的恨起卡羅來，但由於健將被一所三流音樂學院錄取，周先生肯出一筆錢送健將上學，海雲對卡羅生的氣也便消解了。海雲的心因放下了極大的擔子而感到無比輕鬆，卡羅再一次接近繼母時，她已軟化了的心接納了他。她還幻想著自己將為卡羅和健將幸福、快樂地活在世上，卻沒有估計到自己已邁進“感情禁區”的事實。

嚴歌苓通過《紅羅裙》所表現的是女性情感出軌的情節。關於女性欲望的描述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出現過，這已經並不是稀奇的事。但兒子與母親（即使是繼母）間的性描述還是較為罕見的，因此小說的色彩顯得更為綺麗。特別是作家特寫了兒子與母親的身體“接觸”，賦予小說以一種重估女性欲望的意義。在嚴歌苓的筆下，女性的身體被敞開，與此同時，她欲望的顫動也不加掩飾的被表露出來。當然，從道德的意義上講，繼母與兒子的身體接觸明明是“亂倫”，但由於作家對這一問題並不以世俗的道德尺度書寫，而是以沖淡曖昧的態度陳述著情節，因此更為突顯了女性欲望的自然流露與釋放。無疑，《紅羅裙》所反映的並非是道德問題，而是在當今社會女性所持有的一種叛逆心裏。嚴歌苓通過這些描述顯示了女性主體的個體意義，由此提升了個人化寫作的深度。

嚴歌苓的另一篇小說《約會》中的五娟與《紅羅裙》中海雲的故事極為相似，如果說海雲將第二丈夫的兒子卡羅當作自己的“小情人”違犯了“性禁忌”，那麼《約會》中的五娟對自己兒子曉蜂的偏執之愛將母子之間的底線毀壞為“無界限”，讓他們出軌於世間的母子常規。在《紅羅裙》中，母親和親生兒子之間的反常關係隱晦所顯，而母子反常關係在《約會》中卻成了主調，描繪出異類情感的獨特情結。

17) 同上，第85-86頁。

《約會》中，五娟爲了再婚從大陸到美國來，從此就定居於美國。五娟的丈夫是近七十的，在美國經營房屋裝修公司的人。婚後過兩年，五娟在丈夫的同意下讓自己的心肝曉蜂到美國來。但五娟的丈夫在機場第一次見曉蜂時就以敵意的眼光看他，而五娟覺得曉蜂的瞬間成長、相貌如此像自己是個讓人瘋狂的迷，因此將兒子接到新家之後，似乎陶醉於血緣的迷，老盯著曉蜂的一舉一動。這時候曉蜂也被母親的“熱愛”被感染似的，呼應於母親的“召喚”。母子倆如此的親密無間，五娟丈夫心中的嫉妒之火越來越猛烈起來，因此他願犧牲點金錢送他去寄宿學校，買來個“平安”。但丈夫越阻止他們母子的之間的“情感交流”，彼此之間的相思程度就越深入起來，深入得無可預測、讓人窒息。因此五娟瞞著丈夫，與兒子約定每周星期四在一家咖啡館裏“約會”，但兩人這樣偷約不久，五娟的丈夫還是認出每周星期四她的不尋常，“他似乎嗅出這份母子情感的成分”。¹⁸⁾有一天，五娟的丈夫忍不下自己的委屈，隱藏在心底的不滿終於爆發出來，他對五娟吐出了讓她喪氣的氣話。但什麼都擋不住五娟對兒子的“愛”，她不顧丈夫的“冷面孔”還是去見兒子時，她發現曉蜂生病了。因此，五娟不忍心丟下兒子獨自回校，她便送曉蜂一起到了他的宿舍。到了宿舍之後，由於曉蜂在發燒五娟讓他脫下衣服，用毛巾擦拭他的全身，又回憶著兒子小時候喂奶的情景。這時候誰都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曉蜂突然扭轉身，緊緊的抱住五娟。她感到自己成了娃娃，被他抱著。

她看到他鎖骨下有顆痔，跟她一樣。你哺育一塊親骨肉，等他長大，你就有了跟你酷似的伴侶。血緣的標識使他永不背叛你。

她抱著他，也被抱著。或許你在生育和哺乳他時，就有了個秘密的目的。或者說是一份原始的、返祖的秘密歡樂。這秘密或許永遠不被識破，除非你有足夠的寂寞，足夠的不幸。

你抱著他小小的肉體時，原來是爲了有朝一日被他所抱。往復。輪回。你變成了小小肉體”。¹⁹⁾

18) 嚴歌苓，《約會》，見於《無非男女》，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頁。

19) 同上，第197-198頁。

那天回家，丈夫對五娟表示了歉意，他給五娟看已準備好的遺囑，對她保證留於她大數目的財產，而且同意曉蜂住家。但已被丈夫的冷心腸傷透心了的五娟對他宣布離開他的決心，收拾了東西去見曉蜂，她想借此機會實行與兒子盼望已久的一同去賭城的計劃。這時她並不知曉蜂已離開學校的事實，他的離去是“交織著忠貞的背叛”，而“她更不知道曉蜂的背叛始於他緊緊抱住她的一瞬”。²⁰⁾

《紅羅裙》與《約會》中所描述的都是脫離常規的愛，繼母與兒子，親生母親與兒子之間濃密、越軌的情感表現都具有顛覆性意義。這回嚴歌苓將“母親形象”描繪為反叛道德倫理的最低線而遠遠超出“人倫”範疇的飄蕩靈魂。也可以說，這不僅是攪混縱欲、焦慮、反叛等當代女性心理的一顆反擊“常規”的炸彈，也是一次嘲諷權威的後現代式造反。換句話說，嚴歌苓借以移民女性形象的塑造不斷探索所謂的“權威”與女性之間的關係，這一次作家所瞄準的“權威”就是個“神聖”的人倫。因此，她將最為神聖的母親形象描述為淫蕩的半裸女人，因而剝去了母性的神威。但更為刮目相看的是，《紅羅裙》與《約會》中海雲和五娟是個自願失去母性神威的人，於是這次的叛逆卻營造了最為隱私的個人空間，而不是為單純貶低女性而存在的“空蕩話語”。作家以打破母性權威的形式表現了當代女性心裏中的“反叛”意識，因此而再次拓展了個人化寫作的“深度”。

與嚴歌苓的這些書寫比起來，談“母性”的其他移民女性形象的作品注重表現女性的生命據於母性之愛的常理，顯示了與嚴歌苓所描述的母性之間露出的截然迥異。比如，原志的《生個加拿大》中馮建為生兒子說服自己的妻子盛季琦移民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原有一個女兒的他們迫切盼望再生一個兒子，特別是對於馮建來說生一個兒子可以說是他一生中的最大願望。兩人到了加拿大後馮建靠從到處得來的各種“秘方”試於夫妻生活中，為生兒子的計劃不遺餘力。但事與願違，季琦又生了個女兒。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馮建，又建議盛季琦再生一個孩子，他對盛季琦說他們已有嘉佳和娜娜，因此應當再生個“大”，這樣可以完成生“加拿大”的大計。盛季琦只能屈服於馮建的嘮叨和堅持又懷上了孩

20) 同上，第200頁。

子，但她想到馮建喝酒之後與他同睡的情景，就趕去醫院欲做人工流產。但到了預定做手術的當頭，她的心就變卦了，她覺得自己作為女人只讓男孩見天日，不讓女孩見天日是不公平的，因此她就下決心不管男女她都要生，而且這就是最後的一次“掙紮”。又到了分娩期，盛季琦到醫院時，接生醫生告訴她竟然懷雙胞胎，而且是一男一女的消息。她急忙給馮建打電話“讓他早一點分享到這份來之不易的幸福和快樂”。²¹⁾

餘曦的《成年》中，早年江雪的丈夫柳理華在美國讀碩士，當時江雪因跟著丈夫去美國陪讀，只能把七、八歲的女兒雯雯留於上海，此後再過三、四年他們定居於加拿大的時候，才把她接過來。由於三、四年的間隔拉長了父母與女兒間的心距，因此女兒到加拿大之後迎接十五歲的生日時，江雪格外在意為女兒所要做的事情。意外的事，女兒從學校回到家之後江雪打探女兒的心中打算時，雯雯卻對江雪說自己要在一個男朋友家搞派對，而且在那兒要過夜的想法。這時候江雪覺得她從上海接來女兒之後一直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但她經過左思右想，忍受心裏的劇痛之後，決定按現代的思路去了解女兒，她去了連鎖超市買回避孕套，對女兒說了一番sexual problems(性的問題)之後，把避孕套遞給了女兒。她又為討女兒的歡欣，自己開車把女兒送到要舉辦派對的男孩子家。雯雯快要下車時終於抱住了母親，說了聲“媽媽，謝謝你！”。“被女兒意外的鼓勵和褒獎感動得熱淚盈眶的江雪，在汽車裏坐了許久，看到其他家長將孩子送來了，才開車離開”。²²⁾回家後，江雪發現雯雯根本沒把避孕套拿去，此刻她意識到女兒“無言的保證”，便歡喜得嚎啕大哭起來。

原志的《生個加拿大》和餘曦的《成年》所講述的都是母性的偉大和一種犧牲，因而它散發出母愛的“原漿味”。也就是說，《生個加拿大》中的盛季琦雖然不得不當了傳宗接代的“工具”，但一有母性的生發，就不管自己三十六的高齡，也不管孩子的性別，還是要讓孩子出世而見日。《成年》中，江雪隱忍自己對女兒的執著，極盡全力要去了解女兒，抑制內心的不安和顧慮，去滿足

21) 融融、陳瑞琳主編，《一代飛鴻：北美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說精選述評》，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版，第760頁。

22) 同上，第774頁。

女兒的虛榮心。結果，女兒還是感覺出了母親的深愛，母女之間的暗中爭執由此了結，彼此間就有了一次真正的溝通。

正因為如此，《生個加拿大》和《成年》等所表現的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遍母性，在那兒看不到任何“背叛”母性的跡象。與這些寫作相反，《紅羅裙》與《約會》中所突出的是女性欲望與普遍規則之間的沖突，也可以說是自我矛盾中無法自拔的另類“母性”。因此，嚴歌苓書寫中的“母性”是打破權威、粉碎普遍理性的“特殊法則”，這是一個個體情感的深刻印記，也是嚴歌苓為反映當代女性情感的“異態”所展示的另一種藝術張力。

結 論

嚴歌苓筆下的移民女性形象聯系著對於女性生命價值的思索。這些女性形象所建立的私人空間保護、滋養著女性忠於自我本質的主體意識；因而在這些女性形象中湧動的主體意識、袒露的人性都沒有阻礙地奔流而起營造出濃鬱的個人化情趣。從人物內心的活動古城與面對世界的態度可以看出，兩性的周旋與外界給女性所套上的戒律不再是作家所要追探的主題，而女性的內心情感體驗成了問題的核心所在。這可以說是作家了解世界、探索女性情志的一種獨特視角；而這個探索移民女性內心情志的過程同時也是作家追求和建構當代女性審美意識的過程。

嚴歌苓作為長期蟄居海外的女性，無疑飽嘗過移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但這些酸甜苦辣並沒有使她消沉，相反她所表現的移民女性世界卻飽含著不被外界力量駕馭的崇高性靈與為固守心靈感知而不惜叛逆於人世常規的人生態度。這是嚴歌苓的書寫中貫穿始終的核心命題，也是她有意或無意中所遵循的敘事模式。在嚴歌苓的書寫中，關於奇戀、亂倫等一系列題材的小說中上演的各種女性形象不顧一切地、沉靜且充滿激情地忠實於自我內心的尋求。外在的一切戒律對她們而言變得多餘，獨有內在世界的發覺才是她們人生真正所需的生命

取向。作家筆下所描寫的男女之情也好，生活瑣屑也好，都是基於“女性生命的內質探尋與內心體驗”這一核心內容。

小漁們、五娟們的在人生歷程中所吐露的內心情愫與對人生的豁達認知，折射出移民女性全面認同於自我索求、自我意識的光芒。作家在塑造移民女性形象時，將人間的善惡美醜、運行社會的秩序都拋於邊緣，對女性自我的本質進行了基於哲理靈感維度上的思索，這無疑是為重建女性私人化空間所投射的新視角，更是對當代人們繼續深入探討女性問題一次有力挑戰。

參考文獻

- 嚴歌苓,《扶桑》,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 嚴歌苓,《無非男女》,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 喬以鋼,《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文化探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 融融、陳瑞琳主編,《一代飛鴻:北美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說精選述評》,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版
- 馬藜,《視覺文化下的女性身體敘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 齊紅,《世紀之交的女性寫作》,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 楊麗麗、林玉琳、李翰、富瑤、範麗君編著,《歷史上的大移民》,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
- 樊星,《當代文學新視野》,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 劉國福編譯,《移民法—國際文件與案例選編》,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
- 徐鶴森,《民國浙江華僑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 韓昇,《東亞世界形成史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 林丹姬,《當代中國女性文學史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 陳惠芬、馬元曦,《當代中國女性文學文化批評文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 柏棣主編,《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 徐豔蕊,《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十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 李銀河,《兩性關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 [法]西蒙那·德·波伏娃,陶鐵柱譯,《第二性》,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年版
- [美]蘇珊·布郎米勒,徐眼飜 朱萍譯,《女性特質》,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Abstract〉

The image of migrant-oriented women in the writing of Yan Geling

Park Maria

In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image of migrant-oriented women under the pen of Yan Geling toward their personal life-volition, close attention of this author to the individual awareness of women is implied. Compared with other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Yan Geling has always been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intrinsic disposition of female life. Therefore, while molding the image of migrant-oriented women, she endeavors to explore the self emotions and self-contradictions deep in the soul of women, by turning aside such stereotyped propositions as “the foreordination and fate-resignation of women”. In special overseas life, the homeless and forlorn emotion and life experienced by migrant-oriented women have reinforced the aesthetic force of this novel. Migrant-oriented women under the pen of Yan Geling hold fast to self-consciousness, face human nature directly in reality, or even would not hesitate to turn themselves against stereotype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ir perceptual egos. These contents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s have endowed the novel with a profound sense of contemporaneity.

Key Words : The image of migrant-oriented women; rebuild women; facing human nature directly; turning against stereotypes

투 고 일 : 2010. 5. 10. / 심사 일 : 2010. 5. 20. ~ 2010. 6. 10. / 게재 확정일 : 2010. 6. 15.